

辉煌，从这里萌动

——1978年至1984年中山专业镇经济萌芽实录

/林伟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镇域产业集群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以乡镇行政区划为单位的“一镇一品”专业化生产销售体系，学者称为专业镇经济。

对中山市而言，专业镇经济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市18个镇中有省级专业镇16个，且14个为工业型专业镇，拥有35个国家级产业基地，专业镇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达72%，贡献税收达65%。全市超百亿产业集群达到9个，其中超500亿元的有白色家电、健康医药、五金制品、纺织服装4个；超千亿元的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小榄、“中国灯饰之都”古镇、“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大涌、“中国休闲服装名镇”沙溪等专业镇享誉海内外。

专业镇经济先有实践后有理论，“专业镇”的概念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但1978—1984年期间许多镇区已出现专业镇经济的萌芽。在这一历史阶段，这种萌芽是自然随机而不是经过政府的精心培育来实现的。催生萌芽的土壤，是改革开放后深刻的农村经济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从土地中解脱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大调整的背景以及中央搞活经济的鼓励下，哪里有利，就涌向哪里。因此，逐渐出现某种商品在某个镇区中成行成市的现象，专业镇的萌芽也随之出现。

沙溪：海外乡亲为制衣业送来第一桶“金”

2002年10月，沙溪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联合授予“中国休闲服装名镇”称号。作为休闲服装专业镇，沙溪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不懈努力，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79—1983年的探索起步阶段；二是1984—1988年的起飞阶段；三是1989年以后的持续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沙溪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通过与外商合作经营，初步探索借助侨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出现了专业镇经济的萌芽状态。该镇首个“三来一补”企业于1979年诞生于申明亭村。萌芽的原动力，是沙溪为数众多的侨胞群体。

沙溪是远近闻名的侨乡。据1999年版的《沙溪镇志》记载，最早在南宋景

炎年间（1276-1278 年）就有乡亲出国谋生，旅居国外的侨胞和旅居港澳台地区的同胞总共 7 万多人，分布在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海外沙溪乡亲在外起初靠出卖苦力为生，稍有积蓄便从事小贩小商行业，而以贩卖布匹者为最。香港的永安街就因为多数铺面为销售布匹的隆都人（沙溪古称隆都）所开而被称为“隆都街”。20 世纪 70 年代后，卖布行业日渐式微，侨胞与港澳同胞把目光转向正在兴起的制衣及服装行业，不少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当祖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敞开时，具有爱国爱乡传统的海外乡亲便为沙溪服装业的发展带来第一桶“金”。

具有标本意义的申明亭制衣综合工艺厂就是在香港乡亲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79 年春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神州大地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成为主旋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几十名香港乡亲组团回乡省亲。他们看到家乡百废待兴，便想从根本上帮助家乡解决贫穷问题，为此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各抒己见，都说了家乡从富庶之乡到目前状况的历程，“要振奋，不能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当‘伸手派’”。旅港乡亲打比方说，我们挑水你来吃，再多也不行。不如大家出力挖口井，一起打水吃，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参会的申明亭村村民感受很深，觉得“不能总靠外援，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可解决根本”。座谈的结果是要改变以往捐钱捐物的单一帮扶模式，改“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而当时许多乡亲在香港正是从事制衣业，香港乡亲杨玉维一提出可以发展制衣业，就引起大家共鸣。于是，在杨玉维、杨棣增、杨文立、杨文鸿等乡亲带动下，集资 40 多万港元，捐赠各种电动制衣车和一批配套设备共 84 台，申明亭制衣综合工艺厂在当年破茧而出。

侨胞送来的这一桶“金”，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产生更深远影响的制衣业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模式。

他们又派了一批有技术的人员回来，培训制衣工人，使这间厂很快就投产，接受对外来料加工，去年（1980 年）共收入加工费 18 万港元，加上国家优惠补贴，共收入人民币 10.4 万多元，占全大队税收收入的 62%。工副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大队粮食生产大丰收。粮食总产增收了 8 万多斤，亩产达到 1130 斤，每人平均分配也由前年的 71 元，增加到 178 元。

这个厂在当时不自觉地承担了推广制衣产业、打造制衣产业多样化的历史责

任。

今年，这个厂又增建厂房，增添设备，从一个客户发展到四个客户，从一个制衣品种发展到机绣等多样款式的服装加工业务。同时，还把服装发放到邻近几个大队去加工，帮助这些大队解决一部分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这些大队也增加了集体收入。

申明亭，这个当时拥有 705 亩禾田，以生产稻谷、蔬菜和塘鱼为主，人均收入低，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村落，第一次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同时还带动沙溪镇制衣业在随后几年蓬勃发展起来。

1984 年前后，沙溪的制衣产业已呈现镇、村、个体等多个层次一齐上的局面，隆都制衣厂大楼、沙溪时装厂大楼、高富制衣厂大楼、申明亭制衣厂大楼等相继建成。1989 年后，与制衣业相关联和配套的行业迅速兴起并建立相应的市场，形成从制造、整染、布匹、绣花、加工服装、销售相匹配的制衣业系列化生产和销售的地方特色，逐步形成今日的专业镇经济模式。

从 1985 年 11 月 11 日《羊城晚报》刊载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窥见当时沙溪制衣业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篇题为《中山钉珠服装加入世界最名贵服装行列》的报道写道：

广东中山沙溪工艺时装厂生产的钉珠服装，已踏入了世界最名贵服装的行列……

纽约是世界著名的服装市场中心，而位于该市的“第七大道”更是集世界高级时装的精华，故有“世界高级时装橱窗”之称。现在，中山沙溪工艺时装厂生产的钉珠服装，已成为全国同行业中产品第一个进入“第七大道”数家高级时装公司的厂家……

去年春交会后，该厂开始由几十人生产小批量的钉珠服装出口。后业务突飞猛进，目前该厂下设 22 家分厂，共 3000 多工人，生产晚礼服、宴会服、长衫、短衫、背心、衣裙以及演员、歌星的表演服。这些服装以真丝布做面料，钉绣上珠片和珠粒组成的各式图案，既是工艺品，又是服装，在灯光和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雅致、华丽，富有魅力。许多国家的厂家生产钉珠服装一般销千件以下，香港的厂家最高纪录曾销 5000 件，而该厂生产编号为

“8411”的钉珠服装，至今已销出2万多件，还继续接到订单，这在世界高级时装市场上颇为罕见。该厂预计今年可为国家创汇150万美元。这些钉珠服装，都是该厂厂长张肇达设计的。这位今年24岁的厂长从事时装设计才五年多时间。由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已成为高级时装设计师。美国纽约“第七大道”高级时装公司的几个商人和设计师对张肇达的聪明才智表示惊讶和赞赏。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出钱出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沙溪专业镇经济的起步历程中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然而，改革开放前，这些乡亲帮助家乡发展的意愿常常被婉拒。

有一次，侨居澳大利亚的申明亭乡亲杨轩回国参加广交会后顺道回乡，见到家乡学校破旧，体育器械缺乏，便决定赠送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一批体育用具。结果，大队干部无人敢接见，体育用具无人敢接受。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大环境影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这种爱国爱乡的意愿才能得到落实。提起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对家乡建设的支援，曾任下泽侨联会主席的林彬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前期，都主要靠华侨才发展起来的。市里镇里许多制衣厂都是他们建设的。最早的就是申明亭村的工艺厂，建厂后村里开始富裕起来。相互影响，镇里、村里都建了许多工厂，才逐渐富裕起来。可以说，没有华侨，村里的经济搞不起来。”

古镇：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个灯泡牵出灯饰业

古镇享有“中国灯饰之都”的美誉，灯饰业是其支柱产业，它发轫于1978—1984年。期间，古镇人民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难得机遇，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打造众多私营企业群。

古镇位于中山市西北面，地处中山、江门、顺德三地的水陆交通交汇点，毗邻港、澳，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地带，具备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古镇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以海洲为例，这一片共有9个村，3000多户，1.4万人，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劳动日值只有3角钱。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劳动力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农业以外的行业，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高。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老

百姓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灯饰业应运而生。

1980年，古镇党委、政府打破常规，将原来生产铁器农具的古镇铁农具厂一厂一分为二，成立古镇家用电器厂和古镇机电厂，这一措施对于该镇灯饰业的萌芽具有历史意义。

新成立的古镇家用电器厂（后来变更为南光电电饭煲厂），大胆研究新产品，拓展新市场。该厂的供销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频繁的差旅中发现了老百姓对台灯的需求。于是该厂便率先在镇内设计出以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个灯泡和灯座构成的简易台灯，不料投放市场后一炮打响。另一家镇属企业——古镇机砖四厂看到这种态势，不甘落后，随即将企业转制为异型灯具厂，生产环形小灯管和台灯。于是这两家镇办企业一先一后拉开古镇灯饰生产的帷幕。

精明的古镇人已敏锐地察觉到灯饰业的商机。他们马上掌握这门“新技术”，纷纷经营起灯饰业。从小本生意干起，以夫妻店、兄弟厂的面貌出现，就近从佛山、南海和顺德等地采购灯饰配件，进行简单加工、组装和仿造，再向全国其他省市推销。大大小小的灯饰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再以海洲为例，短短几年间私营灯饰企业发展非常迅猛，1983年开始冒出以裕华灯饰实业公司为首的多家灯饰生产厂。1984年起，海洲陆续办起涵盖电器、灯饰、印刷、塑料、木箱等的230家工业企业、110家商业实体，平均每10户人就有一家私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5—7人，规模小、经营灵活且完全独立，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情景。其中灯饰行业最集中，占私营企业总数的近40%。海洲被称为“中山小温州”。海洲的灯饰产品以造价低、质量好、造型美观而远销全国各地，也吸引越来越多人投身灯饰行业，为构建古镇灯饰产业的雏形作出不小的贡献。

辉煌的背后是艰辛。当年古镇的灯饰品靠着“提灯走天涯”的精神逐步走向全国。由于当时灯饰最早的市场在我国西部，古镇人就带着他们的产品到成都、兰州去卖。“当初，数以千计的古镇人凭着‘吃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走千山万水’的‘四千’精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真可谓提灯走天涯。”古镇镇商会会长、华艺灯饰集团总经理区炳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最让他终生难忘的就是当年的推销经历。区炳文是古镇人，1983年靠做花木生意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后来转投灯饰业，1986年成立华艺灯饰厂。

1983年初，古镇成立商业公司、信托联营公司等25个商业公司，派出驻外供销人员联系业务，足迹遍布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古镇的灯饰走向全

国的步伐大大加快。

1984年以后，古镇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精心培育灯饰产业群，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集体企业撤出灯饰行业，并实施一系列金融和服务政策。古镇人瞄准市场变化，进一步把握市场需求，家家做灯，户户销灯，逐步由分散到集中，由简单仿制到产品研制及市场开发，短期内迅速形成稳定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逐渐形成今日研、产、供、销“一条龙”的灯饰业专业镇经济模式。截至2013年，全镇共有灯饰厂企12500多家、商铺2600多家，从业人员16万多，产品占全国民用灯具市场份额达60%，出口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涌：旧物新用催生红木家具产业

1978年后，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高品位家具的需求越来越大。新颖时尚的组合柜、沙发、红木家具等走俏，促进了日用木制品生产的发展，个体户发展尤快。据《中山市志》记载，当时中山规模较大的有石岐家具厂、石岐海绵厂、郊区家具厂、郊区藤厂、南下家具厂、大涌镇（村）红木家具厂、古镇家具厂和海洲木社家具厂等。设备较先进的是石岐家具厂，而红木家具系列则以大涌镇发展较快。

明代，大涌日用品雕刻工艺已崭露头角，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向前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全国上下大办农田水利。广东率先从人力操控的农田排灌，进入机械化、电力化排灌的年代。于是，原先作水闸、水窦挡板用的大量坤甸木料从农田和排灌系统中脱离，成了弃置物，这些木料成为大涌人制作红木家具的原材料。

1970年代末，被称为大涌红木家具“祖师爷”的安堂村村民林申活第一个引进红木家具。林申活家传木刻技术，他最早将兴修水利时挖掘出来的坤甸木，用斧子和锯制作成简单的、具有明清风格的家具出售。这些仿古的床和椅子，出人意料地受到人们的青睐，这就是最早的大涌红木家具。1980年，林申活创办鸿艺家具厂，开始大力发展红木家具艺术。在其带动下，林卓荣、林华亦、林寿康等50来名木工也先后办起红木家具厂。大涌的红木家具产业在这些小型家具厂中开始生根发芽。

1982年，鸿发家具厂成立。大涌镇人萧照兴，现任大涌鸿发家具厂总经理、大涌红木家具协会会长，见证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大涌的家具是有基础的，但一开始不是做红木。大涌是侨乡，大家对红木家具有一定认识。兴旺起来的原

因是旧家具的收购，引起了我们制作新家具的兴趣。虽然当时也没什么店面，但是我们生产的家具做出来就卖掉，供不应求。鸿发家具是大涌第一家到广州参加家具博览会的大涌红木家具企业，时间是 1997 年。”

1983 年，全镇经营红木家具的店面只有 3 家，年产红木家具仅 800 件。到 1987 年已达 78 间，一家接一家，一户接一户，逐步扩大规模，形成前店后厂，初具规模，成行成市的家具街，从业人员约 1500 人，年产值达 2000 万元。

此后 30 年间，大涌红木家具行业经历了家庭作坊式生产、厂房机械化生产、规模集中化生产 3 个阶段，现已发展成规模化、专业化、科技化和现代化的产业集群，而红木家具也由生活起居用品，发展成融实用、观赏、收藏等多种价值于一体的艺术品。2003 年至 2004 年，大涌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之乡”。

小榄：开启五金塑料产业之“锁”

早在 1986 年，小榄就被誉为中国“南方锁城”，这时离“专业镇”概念的出现尚有 10 年之久。可见在此之前，五金制品在小榄已成行成市。

五金制品是小榄的传统产业。小榄铁器制品、五金家具、铁农具生产历史悠久，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维修和加工农用和日常生活品小五金的家庭小作坊。20 世纪 50 年代起，小榄的五金生产开始由手工制作过渡到机械生产。

1978 年前，小榄五金企业主要以集体和国有形式为主，也存在大量简单手工作坊式的工厂。到 1978 年，经过发展，小榄镇已初步形成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五金制造业也在这个时期成为全镇支柱产业。此后，该镇工业企业体制由集体、合作、集团公司为主向外商投资、股份、民营、个体为主转变，工业产品由支农型为主向配件型、加工型、出口型、产品型为主转变。1980—1986 年间，小榄的镇办企业开始“三来一补”业务，村办企业也迅速发展，涌现出永大胶粘制品厂有限公司、永宁塑料制品公司等一批较大规模的企业。

提起小榄五金，不得不提小榄制锁二厂。它的前身是一个马达厂。一次偶然的机会，马达厂得到当时广东五矿进出口公司从香港拿来的一把锁的样品，花了 6 个月时间照样做了一个产品，从而得到广东五矿进出口公司的订单，后来锁做得越来越多，形成规模，便于 1972 年正式成立小榄制锁二厂。到 1978—1984 年，小榄制锁二厂获广东省轻工业局指令生产“钻石牌”门锁，该品牌的球型门锁获“国优产品”称号、普通门锁获“部优产品”称号。制锁二厂逐渐发展起来，

同时哺育了该镇一批配套生产压铸件、弹簧、螺丝等配件的小厂。这些厂一开始只是为一家锁厂专门生产一种或者几种配件，做到一定规模后，单一客户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厂方开始向海内外拓展市场，这就为营造现今庞大的五金塑料制品产业奠定了基础。1983年10月，小榄制锁二厂被外贸部、外经部定为“全国出口产品生产基地”。1986年，小榄制锁一厂、小榄制锁二厂、菊城锁厂和铰链厂组成小榄五金制锁总厂（广东固力制锁公司前身）。由于产品出口创汇数额巨大，当年即获国务院机电办批准为“出口基地企业”，并获得进出口自营权。

小榄制锁二厂还被称为小榄五金业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去一批五金塑料行业的佼佼者，其中有广东固力制锁(集团)公司总经理何家权，华锋制锁有限公司总经理、被誉为中国“锁王”的何文烈，广东中山聚龙集团总裁梁伯强等。何家权原为小榄制锁二厂厂长。何文烈扎根小榄制锁二厂20多年，是该厂骨干。梁伯强高中毕业后入厂任宣传干事。他们后来都打破“铁饭碗”，在五金塑料行业中创建自己的品牌。

1980年，小榄镇贯彻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企事业单位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挖掘原有基础工业的潜力，合理安排工业布局，提出“面向外贸、面向市场、面向港澳、面向大工业”发展思路，并设立镇、公社两级工交办公室，用以指导工业发展。同时，还成立工业总公司，统一组织和领导所属工厂企业的一切生产（包括管理、科技、安全生产）和经营活动。这一举措，对1980年代中后期小榄摆脱企业群体“无规模、无名牌、无竞争力”的困境起到决定性作用。

1983年，该镇集体企业中一些技术业务管理人员，离开集体企业“下海”自办企业，或合股开办工厂。初期，部分工厂企业为解决资金不足，挂靠集体单位，借助集体生产业务关系，发展私营和股份企业，从此打破工业领域单一的集体所有制格局。

1984年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小榄在政策上加大对五金制造业的扶持，相继成立服务公司和贸易公司，为企业发展提供市场信息、引进外资设备和技术、拓宽产品销路，同时兴建厂房和交通设施，提供开通电话直拨业务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随着政策与市场不断调节，该镇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形成以锁具、燃气具为龙头，上下游产品及各种配件齐全的产业集群，并于2002年7月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命名为“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

除沙溪、大涌、小榄、古镇外，黄圃的腊制品在1978—1984年间也有长足

发展。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黄圃镇民间制作的腊肠就运销省内、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各地，其制作技术也广泛传播。每年秋末冬初，邻镇及广州、江门等地的腊制品加工厂都争先恐后地到黄圃镇聘请腌制腊肠的师傅。1981年始，镇办的12个肉制品加工企业，与四川、湖南、福建等省联营建办了20个肉类加工厂。1981年产腊肠（肉）2.5万公斤。到1987年，产量直线上升至120万公斤。

1984年是继往开来之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发出“不走回头路”的改革强音。这一年，中山在1978—1984年农村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成效的基础上，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迈出更大更快的步伐。市委在五届二次全会上对发展区乡企业的部署以及陆续出台的一系列资金、财税、信息、供销、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无疑为以集体和私营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山正向蓬勃发展的专业镇经济阔步前进。